

生在《支那》一詞起源質疑》一文中，論及《羅摩衍那》中有「支那」一詞出現的一節是公元三、四世紀加入的，而《摩訶婆羅多》中有「支那」名稱的數章，亦可能遲至公元後二世或三世紀。因此，「支那」一詞出現於印度典籍集中最早也是公元之後的事情了。①

此外，在巴利文的《那先比丘經》(mīṇḍapāṇha)，漢譯的《普曜經》、《佛本行集經》、《十二遊經》、《大方等大集經》、《華嚴經》、《清淨法行經》、《證香火本因經》等經中均有「支那」名號。但由於這些經產生的具體時代均難以確定，所以很難說釋尊在世時就知道有「支那」一名了。

「支那」一名究竟何時傳入中國，確切的年代現已很難考證。但據傳說，後漢獻帝建安十年(公元二〇五年)秦州刺史曾遣成光子入印度，《釋迦方誌》卷上「中邊」篇引成光子言：「中天竺國東至振旦國五萬八千里，(振旦即神州之號也，彼人目之。……) (51:949-1)此說不一定可靠，但至少可以說「支那」一詞傳入我國甚早。

「支那」一名最早見於漢譯佛典，當屬西晉竺法護所譯之《普曜經》，此經第二「現書品」：「秦書二十」(3:498:2)。《普曜經》的異譯本，唐地婆訶羅所譯之《方廣大莊嚴經》第四品：「支那書(Cinalipi)」(3:559:2)。又竺法護所譯之《舍頭諫太子二十八宿經》(即《虎耳經》)曰：「熾盛宿者，普主秦地。」(21:418:3)由於法護是從月支國來，當然知道「支那」的所指，因此將之譯作「秦」。

見於我國史書中的「支那」之名，或相同之音譯，均來自梵文或西域少數民族之文字。最早出現於我國僧人所撰之史籍者，乃齊梁間僧祐所撰之《出三藏記集》卷八：「是故誦其文而不疲，語其文而不倦，甘其味而無足，澹其音而不厭，始可謂微言興詠於

真丹，高韻初唱於赤縣。」(5:5:9:3)僧祐當時用作「真丹」，稍晚於僧祐的慧皎，在《高僧傳》中已4處提到「真丹」一名了。

至於我國正史載「支那」之譯名，最早見《梁書》卷五四「諸夷·中天竺國」：「天監初，其王屈多遣長史竺羅達奉表曰：……王身端嚴，如日初出，仁澤普潤，猶如大雲，於彼震旦，最為殊勝。……」又，《新唐書》卷二二一上「西域上·天竺」載：「貞觀十五年，自稱摩伽陀王，遣使者上書。帝命雲騎尉梁懷珍持節尉撫。尸羅逸多驚問國人：『自古亦有摩訶震旦使者至吾國乎？』皆曰：『無有。』或言中國為摩訶震旦，乃出迎膜拜，受詔書，戴之頂。復遣使者隨入朝。」又《宋史》卷四九〇「外國六·天竺」載：「太平興國七年，益州僧光遠，自天竺，以其王沒徙曩表來上。上令天竺僧施護譯云：『近聞支那國內有大明王，至聖至明，威力自在。每慚薄幸，朝謁無由。遙望支那，起居聖躬萬福。光遠來，蒙賜金剛吉祥無畏坐、釋迦聖像、袈裟一事，已披掛供養。伏願支那皇帝，福慧圓滿，壽命延長。常為引導，一切有情，生死海中，渡諸沈溺。今以釋迦舍利，附光遠上進。』」

二、佛典所載「支那」本義

(一)源於文物國 《翻譯名義集》卷第三：「支那，此云文物國，即讚美此方是衣冠文物之地也。」(54:1098:2)《維摩經略疏垂裕記》第一等同此說，不知何據。

(二)源於思維 《慧苑音義》卷下：「支那，此翻為思維，以其國人多所思慮、多所制作，故以為名，即今漢國是也。」《華嚴經疏》第四七、《新華嚴經論》第三〇、《希麟音義》第二等，均同此說，估計是由於「思維」的梵文Cintā和Cina的音相近而將其意義混

淆。

(三)並無特別意義，只是對中國的稱呼而已。《南海寄歸內法傳》：「且如西國名大唐爲支那者，直是其名，更無別義。」《開元釋教錄》卷七「大支那國」下有小註云：「舊名真丹、振旦者，並非正音，無義可譯，惟知是此神州之總名也。」(55-551-3)

(四)源於繪絹 玄奘譯《大毘婆沙論》卷第十二：「復有說者，諸方亦有法爾聖事，謂支那國雖奴僕等，皆衣繪絹，餘方貴勝，所不能得。」(27-60-23)這並不一定說「支那」的本意是繪絹，但依據此說，我們可以知道，中國的繪絹在當時的印度(《大毘婆沙論》成書於公元二世紀)已頗爲流行。由此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印度人仰慕我中華富足的情景。

又，《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慧輪傳」：「支那即廣州也。莫河支那即京師也。亦云提婆佛咀羅，唐云天子也。」(51-5-2)此處以支那稱廣州，以莫河支那稱京師，不知何據。

三、近世「支那」原意諸論之爭

關於「支那」譯名原意各說之爭論頗多，現擇其重要者略述如下：

(一)「支那」名號源於秦 此說目前基本上已成定論，學者多從之。持此說者最早當數法國漢學家鮑蒂埃(M. Pauthier)。鮑氏所謂的「秦」並非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的秦。而是早在約公元前一千多年時(實際上秦國始於公元前八世紀周平王時代)就建於今陝西附近的秦國。到了秦穆公(公元前六五九至前六二一年在位)的時候，秦國的勢力已經很強大了。由於中亞的商販頻繁往返於中印之

間，秦的大名是很容易傳到印度的。伯希和贊成此說。一九一一年，德國學者雅各比(Herman Jacobi)著文反對此說。謂前三百年印度佛陀羅笈多王在位時，其臣橋底利耶所著之《政事論》即有「支那產絲」之語，而秦朝開始於公元前二四七年，因而《政事論》是在秦朝建國之前。故「支那」的來源非秦。實際上，雅氏之說是由於對中國史不熟悉的緣故。上文已提到，鮑氏所謂秦並非秦始皇統一中國之秦朝。秦之建立較《政事論》之成書尚早了好幾個世紀，所以雅氏之說，全無道理。

(二)源於日南(Jih-nan) 德國學者里希脫芬(F. F. von Richthofen)認爲「支那」名號源於西漢時之日南郡(Jih-nan)，因爲中國與海外之交通，悉由此處。漢桓帝延禧九年(公元一六六年)大秦王安敦之使者，即由日南登岸而至長安。可見當時日南商務之盛。法國學者拉克伯里(Lacouperie)反對此說。拉克氏所具之理由：(一)漢時日南郡不在今越南東京，而遠在其南。(二)古代日南二字之讀音，應爲Nir-nan，並非讀作Jih-nan。所以里氏之說，毫無根據。

(三)源於滇 此說乃法國拉克伯里氏反對里希脫芬之說提出的新說。拉克氏認爲，古代滇國地域廣大、國勢張盛，公元前我國與西南二方諸國方貿易，全得通過滇國。張騫從大夏國回來後，說天竺國商人到中國販運四川貨物，往大夏交易。由印度往四川必經雲南滇國。又滇國之海上交通，可由紅河而至交趾國。故西方諸國所盛傳之秦國(Chin. Sin, Sinae, Thinae)，乃由滇國轉音而來。由於滇緬一線之交通，在自然方面的阻礙(特別是季節變化時對它的影響)要比西域一線大得多，因而這一線並未成爲中西交通的主要路線。既非主要交通路線，其間的貿易又非特別頻繁，且古代印度人由此道知道滇國的遠不及由西域而知道秦國的

爲多，所以「支那」的來源於滇國之說頗值得商榷。同時，張星烺先生在《「支那」名號考》文中並指出：「吾以爲拉氏之說，與中國史書所載滇國全不合也。」

(四)源於羌 此說乃融合鮑、拉氏之說，首倡者乃翻譯家楊憲益。楊氏在《釋支那》一文中指出：「秦與羌本是一字，故漢代或稱羌人爲秦人。明乎此，則我們可知古代印度記載裏『支那』一名的原字實爲『羌』，此字或作『秦』，惟爲種族名，與秦朝無關。又羌字古亦通荊，見《史記·蔡澤范雎列傳》或荊註，由此可知古代荊人亦屬羌族。羌字古又通滇，漢代西羌有滇良、滇吾、滇那、滇昌數種。又滇盾即羌盾，釋名載：『盾中隆者曰滇盾，本出於蜀，蜀滇所持也，或曰羌盾。』由此可見古代中國西部高原的種族通稱爲羌，後分爲秦荊滇三大國，而其名皆源於羌。漢初羌族所居的地域尙極廣大，《漢書》言嬉羌在陽關西南，小宛渠勒以東，戎廬于闐難兜以南，故其地當包括柴達木盆地西藏高原及雪山以北的地域。古代印度記載裏的『支那』地方與此正符，故『支那』的原字當爲『羌』，秦荊滇皆爲羌族一部的異名。」此說問題在於所引的材料大都是漢代的，不太具說服力。至於秦以及秦之前我國西部少數民族是否均被稱作羌，尙需考證。

(有關佛經引文，據《大正藏》。數字表示該例見於《大正藏》之卷、頁及欄次。)

(完)

本文參考論文篇名及參考書目：

1. 張星烺《「支那」名號考》 載《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一冊 中華書局(北京)七七年版。
2. 汝江《「支那」一詞起源質疑》 載《中國史研究》八〇年第二期。
3. 楊憲益《釋支那》 載《譯餘偶拾》三聯書店(北京)八三年版。
4. 伯希和《交廣印度兩道考》 馮承鈞譯 中華書局(北京)五五年版。
5. 日本《望月佛教大辭典》「震旦」條。
6. 《大正藏》諸冊。

註釋

- ①《曼殊全集》載：「支那一語，確非秦字轉音，印度古詩摩訶婆羅中已有支那之名。摩訶婆羅乃印度婆羅多王朝紀事詩。婆羅多王言：嘗親統大軍，行至北境，文物持盛，民多巧智，殆支那分族云云。考婆羅多朝，在公元前四百年，正震旦商時，當時印人仰慕我文化，稱智巧耳。」蘇曼殊此論殊未當。《摩訶婆羅多》的故事雖然取材於公元前若干世紀之傳說，其編纂的時間被認爲在公元前四世紀至公元四世紀末之間，並且書中後人摻進的材料甚多。所以根本不能因爲書中有支那之名便斷定在公元前四百年商時印人就已經知道支那一詞。此說不足爲證。